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郭汉民
暴宏博
编

宋教仁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宋教仁卷

郭汉民 暴宏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宋教仁卷/郭汉民, 暴宏博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721-6

I. ①中… II. ①郭…②暴…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宋教仁 (1882~1913)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188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宋教仁卷

郭汉民 暴宏博 编

Song Jiaore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7.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4 000	定 价	6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宋教仁，字遯初，亦作钝初，号渔父、公明、时雨、弼、弼斋、桃源逸士、桃源渔父，湖南省桃源县湘冲人，1882年4月5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自幼受教于宋氏家塾，稍长，致力于辞章之学。1899年起肄业漳江书院，师从孝廉瞿方梅及教谕黄彝寿，阅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著作及《资治通鉴》、《读史方輿纪要》等，明“夷夏之辨”、历代治乱得失及地理沿革，并作联语以明志：“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人书，在秦汉前。”^① 1901年考中秀才。在漳江书院读书期间，曾与同学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和古今用兵之道，慨言“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后，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②。人多以“狂生”目之，实则在其心中革命思想已经萌芽。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常与同学田桐、吴崑、白逾桓等议论时政，关心国事。1903年结识从日本回国从事革命活动的黄兴、陈天华，志同道合，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他先后参与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同盟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先后参与筹划长沙、广州、辽东和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义，先后创办或者主笔革命报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民立报》，先后参与创建中华民国和民初第一大党国民党，直到1913年3月被政敌刺杀身亡，十年之间中国的政治变革、革命风云、思想演进都与他密切相关。宋教仁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

① 哀时客：《渔父痛史》，见《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10~11页。

② 文思：《宋教仁二三事》，见马志亮主编：《喋血共和·忆宋教仁》，8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

同时也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不仅深刻、独特，而且形成体系。

反帝爱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民主宪政思想和制度建设思想是宋教仁思想体系中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



反帝救亡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是宋教仁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他个人行为的重要指向。他关注祖国的边疆危机，珍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清末革命党人中是十分令人瞩目的。反帝爱国思想是宋教仁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基本、最基础的部分。

宋教仁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在反对清王朝的同时，仍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反帝救亡这一时代主题，关注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俄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及其罪行的评论在宋教仁的全部论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在《二百年来之俄患篇》、《讨俄横议》、《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蒙古之祸源篇》、《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以及《西方第二之满洲问题》等文章中，对列强扩张侵略的种种罪行和阴谋大加挞伐，深刻揭露沙俄与日本是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主要祸源。宋教仁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在上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及所面临的危险。他指出，日俄战争之后，列强在东亚维持均势主义，所谓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均不是他们有所爱于中国，实则由于“各国在中国之势力未均，且各国之他方面情势亦各自不同，不能一致以对中国而实行分割，故不如暂维持现在之状况，勿使变更，以待将来”，列强各怀鬼胎，沙俄觊觎中国新疆和满蒙，英国想继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并窥伺云南和西藏，美国极力向中国内地扩张其势力，而东邻日本则妄图独占中国。这些国家分为两大派，即经济的侵略派，美为领袖，英为之辅；武力的侵略派，日为领袖，俄为之辅。双方必互为雄长，以共逐鹿中原。所以，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危险依然存在，中国仍然是列强竞争的目的物，“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斯时吾国若犹不克为主动的外交，以折冲于角逐场中，吾恐第二之波兰问题将复见于东方矣”。宋教仁从当时远东国际关系分析中国所处的地位，并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即时做出时评，为中华民族敲响危亡警钟。宋教仁对

20 世纪初年远东国际局势的分析是否精当姑且勿论，其作为国际知识丰富的青年政论家和富于理性的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

宋教仁流亡日本达六年之久，对日本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文化做了深刻的研究，并发现在他周围号称“朋友”的一批日本浪人竟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尖锐地指出，“夙具岛国根性”的日本是近代以来祸我中华、乱我中华、弱我中华的主要祸源。正是这个日本，“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成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因而是中国的大敌，是“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宋教仁提醒国人：“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①宋教仁的这些看法已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至今不乏现实启示意义。

宋教仁的反帝爱国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评论上，而且表现在他对祖国边疆危机的密切关注和对祖国边疆寸土不让的坚定态度上。宋教仁在流亡和留学日本期间，对列强侵蚀祖国边疆的信息密切关注，经常加以研究，及时撰写时评，提出解决办法。他先后发表过《蒙古之祸源篇》、《滇西之祸源篇》、《故纸堆中之滇人泪》、《论南满铁路属地行政权混杂之害》、《日人之密窥蒙古》、《中葡澳门划界问题》等文章，对俄国、日本侵略我西北、东北和北部边疆，对英法侵略我云南边疆，对英国侵略片马以及葡萄牙欲借划界扩张领地，都予以揭露与抨击。在这方面，宋教仁对“间岛”问题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值得国人永远纪念。

“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朝界河图们江以北延吉一带“面积约十万余方里”的中国领土，略小于台湾而大于日本四国，日本称之为“间岛”。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之后，朝鲜人越江垦殖，日本亦觊觎这片土地，日本国内舆论界也公然称“间岛”是“鸭绿江源的独立国”，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公然在该处设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据日本学者松本英纪研究，所谓“间岛”问题完全是日本侵华组织黑龙会中标榜“援助中国革命”的内田良平一手制造出来的，他妄图把朝鲜亲日团体“一进会”及“长白山会”移入“间岛”，以便逐步占领这块属于中国的领土。宋教仁警觉到日本的阴谋，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掌握了他们欲变“间岛”为朝鲜土地的证据。随后宋教仁查阅各国图书资料，包括朝鲜古籍中关于中朝边境的记载，从历史、地理、国际法以及

^①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162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语言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著成《间岛问题》一书，以严密的逻辑、确凿的事实论证“间岛”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书成之时，中日正围绕“间岛”归属问题展开谈判。为防止“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宋教仁托友人将书送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公使抄送外务部，“果大有以资于谈判，而获斥退日人之口实”。宋教仁这样做的动机在《致李、胡二星使书》中有明确陈述：“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① 观此不难看出，宋教仁既坚持了与清政府“不两立”的革命立场，又倡导并践行了“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的伟大思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宋教仁，得到过内田良平等日本浪人多方面的支持，而当他发现正是这些“朋友”图谋霸占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清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时，毅然毫不犹豫地、千方百计地要维护这些领土，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大义，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清末革命党人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人对国内专制统治者的仇恨远远大于外国侵略者，他们反满革命的激情远远高于反帝爱国的本能，在他们处境艰难到万般无助的时候，甚至不惜以国家某部分（诸如满蒙）的利益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尽管这一切都是出自“革命”的名义，但终究是不足为训的。相比之下，宋教仁的反帝爱国思想、“宝爱”国家领土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炎黄子孙发扬光大。

二

反清革命思想是宋教仁思想体系中又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宋教仁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的重要标志。

宋教仁早就有“苦满政”之思想，1904年11月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口占长歌云：“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

^①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67页。

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决心“重振夫天戈”，以“完我神圣之主义”，谋求“自由独立”^①。与此相应，他直接否定清朝皇帝年号，主张采用汉族祖先黄帝开国纪年，他1904年开始写日记时就将这一年写为“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这种置“正朔”于不奉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宋教仁的革命立场。他自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在黄帝肖像题词说：“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②在他看来，处于亚东大陆的汉族“集合四百五十余兆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方哩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历史学上之关系，实为东洋文化之主人翁，其地理学上之分布，除本族范围之外，且蔓延于马来、澳洲诸岛屿，更越太平洋而遍及于亚美利加之大陆，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然而此蓬蓬勃勃之民族，自近世纪以来，昧其爱国心，忘其尚武力，被北方一蛮族所征服，丧失其五千余年圣神相传之祖国，为奴隶而无复独立之态度者，已二百六十年；乃至今日，则并遭其主人之厌弃，失其第一重奴隶之资格，又为彼蛮族者所转卖，所再嫁，而为世界上一种最丑最贱最污秽之间接亡国民”，这正是宋教仁从事反清革命的基本原因。1905年10月8日他在日记中更明确地表示：“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③所谓“民族的革命”，就是“反满”，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清末革命党人带有标志性的思想主张。

宋教仁不仅论证了反清民族革命的必要性，而且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革命的理论，回答了在清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夺取革命胜利的手段、策略、原则和条件等重大问题。

关于革命的手段。宋教仁认为，“专制之威非平和所能克”^④。“革命事业，其目的既在举一国之政治从根本上改弦而更张，其手段又不能用强力破坏旧有之秩序，以为新建设地步”^⑤。宋教仁从欧西民党反

①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595页。

②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2页。

③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861页。

④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375页。

⑤ 同上书，386页。

抗专制暴政的历史中看到,“民党之行为,不外乎阴谋与暴动之途”^①。他于是提出了两种革命的手段与方法,即暗杀与暴动。这与清末革命党人的普遍看法别无二致。

关于革命发难地点的选择问题,在清末革命党人中是经历了一番艰苦探索和巨大争议的。同盟会成立之后的两三年中,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陲一带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到失败。并且使同盟会内部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宋教仁为挽救革命危机,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和长江革命思想。1907年宋教仁欲在能“制清廷之死命”的地方策动武装起义,并亲赴东北运动马贼。1910年8月,在数省同盟会会员讨论“改良党务”的会议上,宋教仁首次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在随后召开的十一省同盟会负责人会议上,宋教仁进一步阐述了“革命三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应“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依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获得与会者的广泛认同。直到民初,宋教仁还多次谈到过“革命三策”。

1912年5月15日他在《黄花岗起义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说:“最初,同志计划进行方法各有不同。或主中央入手,如法、葡是,但在我国颇不易为;或主从地方入手,各处同时大举,是亦恐难以做到;最后决定从边远入手。故从前云、贵、广西诸义举,即缘此义而起”^②。

1912年10月10日他在《辛亥革命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说:“当发动之初,亦曾几遭失败,后竟苦心研究,规定计划三条:第一由中央入手,即于政府所在地从事运动;第二由南方重要省会入手,即于扬子江流域各重要地点,联络军警各界,各省同时大举;第三由边地入手,盖边地为人所不注意处,从事革命,布置较易,由渐而来,未为不可。三条之中,第一条最难,第三条最易,故实行之始,取其易者,此去年广州一役所由来也。”^③

①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11页。

②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471页。

③ 同上书,505页。

1912年，宋教仁撰写《程家桢革命大事略》，说程氏“于同盟会曾规画三策，其一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其一遍植党人于各地，以期一地发难，首尾相顾；其一于边疆粤滇各地，时揭义旗，摇撼腹地之人心，令清廷有鞭长莫及之患”^①。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词》中说：他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设中部同盟会，“鉴于前此之失败，乃共筹三策：一为中央革命运动，推倒政府，使全国瓦解，此为上策，然同志都在南方，北京无从着手，此非可易言者；一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此为中策，然此等大举，布置不易；一在边省起事，徐图中原，然前此用之失败，斯为下策。三策之中，谁将适从？则新军如可为用，财政有人接济，中策自属可行”^②。

1913年1月20日上海《民立报》载《湘省欢迎宋钝初》一文。文称广州起义“死亡孔多”，“旋又招集同人于上海经营再举，于是定为三策：一则中央革命，爆发京师，一举事即倾覆满政府，首都既去，则四方可传檄而定，此上策也；二则长江流域同时大举，满清财赋出于南方，得此可以扼满奴之生命，然外人商务亦多在南方，又恐因此惹起外人之干涉，故必先取武汉为根据地，又必同时河南、陕西起义，则断截京汉铁路，使北洋之兵不能南下，此中策也；三则于边省与外人毗连之地，夺取数处，然后进取中原，此下策也。同人再三研究，以上策甚善而苦于难行，下策则必至失败，决定举行中策”^③。

宋教仁多次谈到“革命三策”，表明“革命三策”确是一个重大问题。它使革命党人的长江流域革命计划得以实行，武昌起义得以发动并终于获得成功。宋教仁将“革命三策”的提出归于程家桢的“规画”、同人的“共筹”以及自己的“苦心研究”，应是符合实际的。无论如何，“革命三策”早已深深地打上了宋教仁思想的印记。值得注意的是，“决定举行中策”之后，宋教仁反对军事冒险，主张用较长的时间，各省同时进行周密的准备，一处发动，各地响应，争取一举成功。

宋教仁还密切关注世界各国诸如土耳其、波斯、墨西哥和葡萄牙的革命事态发展，及时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利于正在进行的反清民主革命。他将葡萄牙革命之成功视为“近世革命史上之模范”，“政治史上有

①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521页。

② 同上书，529～530页。

③ 同上书，531～532页。

兴味之一大事件也”。指出“自十九世纪以还，世界大通，各国互相通商遣使，宛然天下一家，一国有事，则无不波及影响于他各国，而各国对于该一国，亦能左右其国之安危，故国家而苟有革命之事，则当新政府甫立之际，人心未定，基础既未强固，野心之国，往往思获渔人之利，又旧政府负隅抵抗，或旧政府既倒，而余党又有乘机窃发之虑，且新政府百废待兴，尤患财力之不足，使非有各国深表同情，予以承认，为之声援，则往往不久而遭失败”^①。基于这种认识，宋教仁认为葡萄牙革命比较顺利地推倒政府，建立新共和国，既能不血刃而事定，又能维持秩序，改革庶政，获得各国之承认，故而宋教仁视之为可资借鉴的“师表”，“欲谋革命之成功者，当以葡国为师表焉”。并且从中总结出“革命成功之三原则”，即革命发动之主旨，当考虑不要使社会太大变动，并且使社会秩序容易恢复。“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窄（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持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三者，盖革命成功之原则也。”宋教仁深信自己的观察不错，呼吁革命同人认真“取法”：“今葡国革命皆本此原则而实行之，所以易被承认而告成功，不诚足为有志革命者所宜取法乎？”^②宋教仁的这一思想获得了长江中下游革命党人的赞同，“群皆赞同先生言，而本是实行”^③。

宋教仁还从葡萄牙革命中汲取了三大教训：“一，革命不得外国之承认，则其目的不得完成；二，革命进行时，不可不预计对外关系，而出以使外国乐于承认之手段；三，革命成功后，不必虑及对外关系之困难而恐其不承认。”^④为此，宋教仁进一步研究了革命党的行为如何获得国际法上“交战团体”资格的问题，以便创造条件，具备这种资格，以利于革命的成功。在他看来，革命军要成为“交战团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已取得一定之土地；二是已建设一定之政治机关；三是所采用的战争方式应是文明的，符合一般文明国所行之习惯。武昌起义后，宋教仁致力于新政府的建设，协助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处理外交事务，也就是这种思想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宋教仁先后提出的革命根据、手段、方略、原则及赢得

①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386～387页。

② 同上书，387页。

③ 徐血儿：《宋教仁先生传略》，见马志亮主编：《喋血共和·忆宋教仁》，16页。

④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386页。